长官部办公厅梗概

阮修治

第三战区，创建于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役。当时，由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不久，冯玉祥继之。沪战结束，南京陷落，原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升任三战区司令长官，直至日本投降，前后历经八个年头。

三战区，幅员辽阔，大体上辖苏、浙、皖、闽、赣五省。由于战火不断扩大，战线蔓延，与当时已迁都重庆的国民党中央，相隔遥远。顾祝同从北伐以来，跟随蒋介石征南战北，唯命是从，深得蒋的信任。在这鞭长莫及的情况下，对拥有数十万大军，保卫东南半壁河山的重任，唯有顾祝同是蒋介石心目中较为合适的人选。顾祝同自当上三战区司令长官后，就独揽了战区的党、政、军大权，不断设置机构，形成庞大的指挥系统。长官部办公厅，外界叫总办公厅，是这庞大指挥系统的枢纽。

办公厅的主要成员，除参谋长三易其人，及其随从人员伴随调动外，其他人员变动极少，故在组织形式和职能上，前后无甚变化。我于1942年浙赣战役后调三战区参谋处，1943年到办公厅，现就自己所知片断情况，简要予以记述。

（一）

办公厅内在编制上并无科室。就当时战争环境，各单位都借用民房办公，办公厅亦不例外。所占民房都隔成小间，习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称作室，几个工作内容相同的人员，挤在同一室内办公。这个室便以其具体人或工作任务而命名，并在门口挂上牌子。如：长官办公室、收发监印室、随从室、卫生室、会客室、会议室和机要室。在上饶皂头和铅山五都前期，办公厅前面六室都在一幢房子内，后者（机要室）设置在毗邻的另一民房中。

在铅山五都后期，三战区新建了礼堂，办公厅即搬进了礼堂后台，机要室秘书人员也同时并进一道办公。

长官办公室，顾名思义应该是司令长官办公的地方。室内长桌上首，虽备有座椅，却经常闲着，只有每周二、五，顾祝同才来上班，其余时日，均在官邸。顾祝同，字墨三，江苏涟水人，保定军校六期毕业，担任过黄埔军校教官，二次东征当过连长，北伐战争时，在龙潭和徐州两次战役中建有“功勋”。1941年他秉承蒋介石之意旨，制造了皖南事变。

顾祝同对下属以善于拉拢，宽厚著称。常以“批责会遭人怨，赞许可团结同仁”来教诲办公厅内人员。故在厅内常是表面平静，未见人与人之间有什么争吵。他的时间观念很强，强调“今日事、今日毕”。有时下班后他会叫随从副官来查看室内文件夹中有否遗留未办的文件。如发现遗留文件未办，便拿去自己批。这一来，他办公室内从无隔夜不办文件。象我们这些小职员，对公文也就丝毫不敢拖拉了。

顾随带身旁的是许文蓉夫人，听说他还有几个姨太太。那时三战区军务处长陆骏声，年逾花甲，还在铅山五都占娶乡村姑娘做小老婆，顾不闻不问，因为他自己都如此，也就难以启口干涉。

长官办公室内，历来只有参谋长、秘书长和高参一、二人经常准时来办公。所以大家把长官办公室叫作参谋长办公室和秘书长办公室。机要室主任也常来办公室办公。副长官上官云

相，一年只偶然来几天。还有各省主席如：韩德勤、陈仪、黄绍竑、刘建绪、曹浩森均兼副司令长官，却从未在办公厅见过面。参、秘、高三者亦各有分工，依次负责军事（作战、训练、补给等）、行政（人事、省际文电、内部事务等）与特务（电台、情报、治安、党团活动等）。有些事情虽是三人讨论决定的，但顾规定只许一人签发，以明专责。一般工作都由专责者批准用顾名义发文。特别重要的文件，才送顾亲自阅批。

三战区参谋长先后易职三人。先是邹文华，江苏江都人，保定军校毕业，先后与顾同学，其后又毕业于陆军大学六期，向来与顾过从甚密，人称他为三战区“三华”（邹文华、朱华、卢觉华）之首，是顾幕僚中三支柱之一。1942年夏，浙赣战役后调离。继任黄百韬，字焕然，河北人，陆大特训班毕业。态度严肃，很少与下属接触，俨然一君子。他办事严谨，文笔亦佳。1943年冬调任兵团司令（原25军）后离去。1948年冬淮海战役中，在苏北碾庄被人民解放军击毙。

接任黄职的是温鸣剑、字明敬，广东梅县人，陆大九期及美国陆大36届毕业。带过兵，当过师长，原任战区干训团教育长。此后温还当过步兵学校校长，以从事军事教育著称。据说他出任三战区参谋长，与当时指望美国盟军在我国东南沿海开辟第二战场有关。他又是盟军东南亚司令官史迪威的同班同学，有校友情谊。温富有西方民主作风，喜和下属亲近，工作之余，常与下属或卫士一同玩乐。人们在背后称黄百韬为“东方儒将”，温为“西方儒将”。其实西方无儒学，何来“儒将”，不过是赞其作风而已。他身材魁梧，每晨必练气功和骑术，也爱好游泳，性格开朗而活跃。工作起来十分认真，处事亦谨慎，下属初拟的外发文稿，温都要亲自过目，逐字审阅，有时还给删改，也有退稿重写情况。记得有一次对军务处某科员一件

退稿中批示："龙飞凤舞，阅之眩目（讽其字迹潦草，难以辨认）。洋洋大章，味同嚼蜡，倒不如1、2、3、4言中为好。书法银钩铁划固好，只要横直分明，我说铜钩不划也可以"。可见他不但要求文章段落分明，措辞精辟，也重视书法。讨论问题时，温鸣剑喜欢别人提相反意见。他认为相反意见能促人深思熟虑，集思广益，方可办事周到。对唯唯呐呐者，他视为庸才，不予重用。

顾祝同用人唯亲。办公厅内大半人员，是江苏涟水或淮阴人。有的虽不是同乡，也必是亲戚好友或同学。而温鸣剑却与其相反，他用在随从室内的四人：邢祖援是苏南人，徐孝刚是上饶人、我是浙江人，只有随从副官黄××是广东人。大家萍水相逢。他强调用人"唯贤"，与顾形成了明显对照。

中将办公厅主任朱华，字实秋，人们都叫他秘书长，何许人氏已记不清，可能也与顾是同乡。据说教过顾的文史，与顾交厚。朱为人和蔼，沉默寡言，执掌政务，与各省主席关系处理得很融洽。朱办事不武断，总和别人商洽后决定。下属有困难，他必尽力解决。管人事尚无怨言，对顾稳坐三战区司令长官宝座，出力甚大。

中将高级参谋卢旭，字觉华，安徽庐江人。兼任联秘处处长，保定军校毕业，与顾也是同学，随顾多年，深得顾的器重，主管情报特务。此人阴气沉沉，望之生畏。他主管的文件，均亲自拆封批阅，除顾和联秘处经办者外，任何人都不明其内容，厅内人员也不愿和他接近，敬而远之。

警卫室：办公厅的警卫，是由长官卫士队派来充任的。其他直属单位的警卫则由特务团（后改警卫团）派遣。守卫办公厅的卫士约八、九人，每隔2小时换岗，轮流执勤，都佩短枪。他们的射击技能相当高超，虽不能百步穿杨，在一、二十米处

随手击中苹果大小物体，是有把握的。他们经常在附近的一个山坳中练习射击，不知要花多少弹药，才练就这手功夫。长官部整个卫士队约三、四十人，队部设在顾的官邸旁边。

收发监印室：专门负责各直属单位来往文件和机要室译出的外来文电的管理。其任务是将长官批示的文稿发送承办单位处理抄缮，然后又把各单位缮正后的文件校对盖印发出，所以它叫内收发。机要室办理对外文件的收发处理，便叫外收发。该室成员计有少校监印官一人，顾姓上尉课员一人，吴姓司书一人，他们大学和高中文化不等。另有传达四、五名，都是军士级。这些职员中，大都是苏北人，每天收发文件多至千件，少亦数百，相当忙。尤其发布告时，盖印几千份，日夜不停，监印官忙不过来，便叫传达代为盖印。在这里保管、使用的印有两方，大者如砚，小者如火柴盒，但都正方形，不用时即用黄绸包裹，锁进保险箱里。

随从室有五人。长官的随从副官徐延辉，少校级。参谋长的随从副官黄某，上尉级。他们都在长官的官邸工作，很少来室。还有少校秘书徐孝刚，上饶人，专办温的私人来往函件，一般书信都由他代笔，对上级或重要事情才由温亲自执笔。1943年，中校参谋邢祖援和我（时为上尉）负责整理参谋长主管的军事资料。其中有各战区的军情通报，干训团的教学计划，战区内的我军位置，调动情况，敌情变化，战斗情况，以及敌后情报译电等等。我俩要摘出上述各项文电的主要内容，于原文上用红铅笔在主要部分划上记号，有时还附上小条子签具处理意见，这就叫作签呈。每人经办文件数百份，还要在会议室墙壁上所挂的30万分之一及200万分之一军用地图上，用红、兰色小三角旗标示敌我（联队或团）部队位置。师或旅团以上用小方旗。当天有变化的部分，我方用挂上红色丝带标明，以资醒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日。平时每天工作八小时，战时两人昼夜轮换，工作达十二小时以上。值夜班要去参谋长官邸，其家中办公室里也设有同样的地图。值班时我们守电话，做记录，遇紧急情况才把参谋长叫醒，工作十分辛苦。当时我们都很年轻，热爱祖国，为挽救民族危亡，从不叫苦，想在工作上尽量表现好一点，但主要不是为了个人的升迁。

办公厅的伙食，在那战争年代，还算不错，是包厨的。我们三人二菜一汤（其中一荤一素）。中午长官办公室的三位将领，也是二菜一汤，不开小灶；表示与下属同甘苦。我们的伙食费虽和参谋处一样，但伙食确比参谋处好。包厨人对上奉迎，由此可见一斑。

秘书长和卢高参主管的文件，都由他们自己拆封亲阅，不交我们办。他们的私人函件分别由机要室和联秘处的秘书办理。顾的私人函件也由机要室办理。不过他们负责处理这方面的文件比例不多，而参谋长负责部分要占十之七、八。由于日理文件数百，多则千件，样样亲自过目，实不可能。所以随从室，实质上是参谋长的幕僚室，专门协助参谋长办事。

会议室是接见内外宾客的场所。平时都闲着，下属来访，均喜在随从室等候，好聊天，接见时偶尔坐一下。总司令之类高级将领来时，都直入长官办公室或官邸，也不用在会议室会晤。

会议室是战区召开高级将领军事会议的地方。开会时，由宪兵和特务团担任警卫，各副司令长官、集团军总司令和一些军师长等聚集一处议事，新四军军长叶挺也到会几次。直属单位每周的工作汇报，也在会议室举行。室内置有几张长桌拼成的长会议桌，上覆兰台布，四周摆满背椅，两廊壁上悬贴全国和本战区的敌我态势图（即我们每天要插小旗的军用图）。这

个态势图平时用布幔遮盖，可是遇外国顾问来时，上级要我们布置假的敌我概况，如故意标出日本关东军内调情况等。会议室房门常锁着，只有参谋长和我们有开门钥匙。

在办公厅工作时，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外出时定要和同室者打个招呼，告以前往的地点，以便随时叫唤。这一不成文的规定，大概是为了临时发生情况便于找人，以及防范外出人员为敌人伤害所采取的措施之一吧。

机要室，由于人多，与办公厅在一处住不下，而分设出去。但总毗邻办公厅的近旁。有主任一人，姓权、名衡，字致五，江苏涟水人，是顾祝同的同乡又是老部下。随顾逐级上升。机要室内原有各室，因不好叫，便改称股，计分文书、译电和收发三股。这里的收发是收受外单位文电为主，进行登记摘由后，再转送到内收发。文书股内大多是秘书，以股长黄抱云，秘书徐策群和课员毛泰漠等人比较有名，这几人均大学程度，只有司书姜中原是高中毕业生。

（二）

三战区设立这么庞大的指挥机构，无非是想能运筹帷幄，考虑周详，以克敌制胜。但是一九四二年五月浙赣线会战后，对一般的与敌人战斗，概由各有关集团军或军自行决定与掌握，随时将战况向长官部汇报便是了。较大的战役（师以上兵力的投入），战区也仅是从中指导而已，似乎权力完全下放。在正常情况下，每年春秋两季，战区领导要召集军以上高级将领（包括军参谋长）来长官部办公厅举行军事会议，讨论当前战略决策。

一九四三年春的高级将领军事会议，于三、四月间在铅山五都召开。我因担任记录也列席了会议。当时，在我国开辟第

二战场的呼声很高。会议中温参谋长主张捕捉有利战机，组织一次较大兵力的决战，以长我志气，灭敌人之威风，赢得盟军信服，而促其早日在我东南沿海登陆，以便配合我军反攻。而参谋处长魏翰则认为应将兵力分散，占据大面积乡村，以面吸点，以面断线，牵制敌人，避免与敌人决战。同时提出日军武器精良，士兵素质好，决战的代价太大，把主力都拼光，，还谈什么迎接盟军。两相坚持，一时会场沉寂。我这小字辈，自觉人微言轻，原不想插话，但在参谋研究班中，受宦乡讲授敌我态势的激励，感情难以自制，便举手问司令长官，我可否发言？顾对我微笑，示以同意。于是我便讲了一则“假途伐虢”的故事。事后魏翰叽我乳毛未干，娃娃小儿何以言战。但我仍不服气，在《前线日报》上连续发表了“假途伐虢”和“论项羽彭城之战”等文章。（均由宦乡删改后刊登的），予以驳斥，此是后话，暂不置论。当时会场上我这一投石，竟引起了波浪，战与守的争辩甚烈。李默庵总司令等主战，上官云相副长官等主守，一时难以统一。最后顾祝同还是以折衷主义、中庸之道把争论摆平。结论是在有利时机，组织部分（大概以一个军的兵力为限）的决战，仍属必要，但保持实力，迎接盟军反攻的策略也不可弃。不久，战区便确定了保全实力的作战方针，开始建设闽北山区根据地，构筑闽浙边界仙霞岭阵地（我也被派参加仙霞岭阵地的勘察和布置工作）。

其后，三战区长官部确也组织过丽水和龙(游)、衢（州）两次战役，各歼日敌数百及千余人。两次战役中，我方阵亡彭孝儒和余丕富二个团长及营连长十余人。

当时，实际上军以上的会战，也不是顾祝同说了就算的，还得听命于重庆最高军事当局。

记得机要室秘书黄抱云，古文造诣较深，爱弄文墨。在我

们布置寝室时，他赠送我一条幅，上面写着："相逢之地在天涯，古渡衰阳夕照斜，号角声哀吹落木，江村人寂乱啼鸦。铜途荆刺几经过，尘海难平总有波，春风秋雨月明夜，多少离人增乡愁，闻鸡起舞志更坚，卧薪尝胆仇心田，终有河山光复日，死安生慰歌当年"。这首诗，写出了当年浙赣战役后的凄凉情景，而前方敌我激战仍然不断，灾难连绵，人们流离失所，盼归心切，只有坚持战斗，终将得到最后胜利。这也反映了当时军民的共同愿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情报室琐记

徐从周

一、情报室成立的缘由

在情报室未成立前，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部对于各地情报的审核、编报和处理，是按照情报的性质，由参谋处和政治部分别办理的。关于敌伪和新四军的军事情报，由参谋处负责审核、编报，并拟具处理意见，签呈参谋长和司令长官顾祝同核定后处理。关于敌伪和新四军以及其他党派的政治活动情报，则由政治部负责审核编报，并拟具处理意见，也签呈参谋长及顾祝同核定后处理。这是一项不能更改的重要法纪。可是，事实上往往有这种情况，即：一个情报中，却包括有几个内容和几种性质。承办单位如先送参谋处办理，则耽误了政治性质部分或军风纪事件的审核、编报和处理的时间；如先送政治部办理，则又耽误了军事性质部分的审核、编报和处理时间。况且，长官部机关大，层次多，一份文件需要经过一道道关卡审阅批示，手续极繁。加之，当时三战区长官部驻地在上饶皂头，是一个农村小集镇，各直属机关驻地极为分散，传递公文，诸多不便，需要一定时间。因此，编报既难统一，处理又很缓慢，使有些重要情报失去时效，影响军事行动和政治工作的开展。为了防止这一弊端继续延误下去，提高情报的时效，长官部决定成立情报室。这是原因之一。

再者，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为了瓦解汪伪的兵力，曾

颁布了策动汪伪军队反正办法，并令各战区要加强进行策反伪军的工作。而当时的汪伪部队，也确有密派代表来三战区长官部联络，接洽反正投诚事宜的。同时，策反工作又与搞敌伪情报工作密切有关，当以集中一个机构办理为宜。因此，很有必要成立一个专管机构来处理这方面的有关事项。这是原因之二。

其三，当时国民党顽固派正制造反共磨擦，对于驻扎在三战区辖区内坚持抗日的新四军的一切活动，自然要引起三战区长官部的注意和搜集。为使新四军的一切活动情报，在审核、编报时，不影响时效，设立情报室这一机构，更为所需。这是原因之三。

第四个原因是：当时，三战区长官部所属各单位，以及驻扎在战区辖地内的各部队的官兵，军风纪律很坏。贩毒走私、敲榨勒索、吃喝嫖赌、贪污受贿等违法事件，时有发生。为了加强对这类案件的处理、整饬，势必要进行侦破和调查，这也需要建立一个专门机构来负责办理。情报室就成了意想中的最好组织机构了。

基于上述这些原因，故在一九三九年九月正式成立了第三战区长官部情报室，（简称情报室）。

二、情报室的机构设置、组成人员和业务分工

情报室这一机构，在长官部的建制上既未列编报，也无经费。因此，情报室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从参谋处、政治部、军务处和办公厅等单位调用的。对调用人员的要求较严。条件是：在原单位担任过编审情报或参加过策反工作，以及办理过违犯军风纪案件并有丰富经验的人，并是军校或特训班毕业生，才算合格。总共抽调了十五、六人，全部集中在情报室办

公。

情报室设主任、副主任各一人。主管情报室的所有一切业务工作。下设三个组和一个秘书室。各组设组长一人，组员若干人，分别承办各组所担负的各项工作任务。秘书室设秘书、助理秘书各一人，主管情报室的文书工作及核阅各组所签办的各种案件和文稿。下设中、上尉书记各一人，少、准尉司书二、三人，分别承办有关文书收发、登记、缮写、校对和文件保管、档案等工作。

情报室主任由长官部指派中将高级参谋卢旭（又名觉华）兼任。卢是安徽庐江人，保定军校毕业，与顾祝同、韩德勤等同学，先随钱大钧（亦是同学），后随顾祝同工作多年，关系密切，深得顾的信任和提携。他随顾在国民党部队中，曾担任参谋处长、副官处长、重庆行营高级参谋等职。在长官部时，官衔是中将高级参谋，派在办公厅与参谋长、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等一起办公，分别担任审批、处理各单位所签拟的各项公文案件。卢兼任情报室主任后，仍在办公厅办公。关于情报室每天所拟办的文件，都要呈送他亲自过目，由他审阅拟办。

副主任指派少将高级参谋林斧荆担任。林是福建福州人，黄浦军校三期毕业，与王耀武等同学，他跟随王在部队工作多年，交情至深。一九三八年由王介绍来三战区任高级参谋。一九四〇年，调入三战区干训团战时工作人员训练班任主任。一九四二年左右，又由王来电调去。林调离后，副主任这一遗缺，迄未派人接充。

秘书室主任秘书倪国经，浙江平阳人，中统分子，由娄子匡介绍到长官部担任上校咨议。他与林的关系很好，交情也深，是林提名调用的。倪曾在政界工作多年，当过贵州省都匀县

县长。未调前，是长官部办公厅的上校秘书，担任编辑工作月报及拟写上级官员的讲演稿等工作。助理秘书徐从周，安徽庐江人，中校，是卢旭的亲侄婿。他担任协助倪核办各组文稿工作。平时，秘书室的一切工作，均由主任秘书倪国经直接向卢或林请示商承办理，外人很少插手。

情报室下设三个组。第一组：主办策动伪军反正业务。根据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军委会)颁布的策动伪军反正办法，拟订策动伪军反正计划，以及策反人员奖励办法；与策反人员或伪军代表联络、接洽反正事宜；核拟策动反正伪军的名义、番号；核给反正伪军的奖金、给养；以及拟定伪军反正后编制、番号等各项工作。该组组长原由副主任林斧荆兼任。一九四〇年林调任鹅湖干训团战时工作人员训练班班主任后，即由中校组员刘兴汉代理组长职务。刘是江西人，一九四一年病死于任内。组内有中校组员董南辕，湖南湘潭人，军校特训班二期毕业，复兴社分子。少校组员陈铭勋，湖南人。上尉组员郝雨辰，安徽怀宁人，中统分子，并为卢旭的亲信之一。中尉组员吴杰，安徽桐城人，三战区特务技术队学员。中尉组员翁国璋，皖南人，亦为特务技术队学员。

第二组：主办情报登记、审核、编报及指导搜集各单位情报等工作。对于重要情报或有时间性的情报，要随时专案呈报，对一般性情报或时间性不强的情报，可分别以每旬或每月编报一次。旬报、月报的内容：分为敌伪军事动态、政治活动、党务活动、经济情况、社会情况；新四军的军事动态、政治活动、民运工作，以及其他党派活动等。旬报、月报除呈报战区司令长官及长官部所属各有关首脑机关外，还要按时上报国民党军委会。此外，该组就所搜集的比较有系统性的情报，要随时加以整理，并汇编成各种调查专报，如：新四军某师、某团

武装实力调查专报，新四军民运工作调查专报，伪军某军、某师实力调查专报，等等。对这些不定期的专报，也要随时整理上报国民党军委会，并分发战区所辖各有关单位、部队参考。二组组长原为陈淡如，湖南长沙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一九四〇年，调任新四军上校联络参谋后，改派郭丽森接任组长职务。郭是江西万安人，原为江西行署情报负责人，特务分子。组员莫良夫，中校，浙江吴兴人，中统分子，负责主编情报工作。组员王国荣，中校，江西上饶人，中统分子，由娄子匡介绍来三战区长官部当中校服务员。组员易同和，少校，江西宜春人，军校特训班一期毕业，复兴社分子。

第三组：主管情报室的人事和总务。负责指导军需、副官，分别办理经费、薪饷、粮食、被服以及其他一些杂务。组长刘旦辉。一九四〇年，刘调任苏南特派员后，改派徐从周兼任。组员中，有中校军需麦涤生，河南人。上校组员陈运陶、徐治敏，以及上尉副官徐业庭、张克雍等。

三、情报室的主要活动和工作

情报室的任务从表面上看，包括敌伪情报、策反伪军、新四军情报、各党派活动以及所谓国民党部队的军风纪问题等等。但实际上，情报室的主要工作和它所进行的主要活动，是着重对付共产党、新四军的。

（一）、增设各种谍报（特务）组织，加强刺探、搜集共产党、新四军的各种情报。

情报室成立后，为了配合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的需要，扩大情报来源，经签呈批准，委派中统系统驻三战区负责人娄子匡兼任长官部驻浙特派员；委派军统康泽系统驻三战区负责人张超兼任驻皖南特派员；江南行署情报负责人郭丽森兼任苏

南特派员。目的就是利用这些特务头目和他们手中掌握的各自原有的特务组织，加紧搜集共产党、新四军的情报，为三战区的情报室服务。

一九四〇年，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活动的逐渐升级，三战区长官部又签准再增设六个谍报组，概归情报室管辖。其中，直接派驻新四军驻地——皖南地区的多达四个，即：

徽宁谍报组：辖徽州、歙县、休宁、宁国等地。组长周少怀。副组长翁国璋。

宣芜谍报组：辖宣城、郎溪、广德、芜湖等地。组长易同和。副组长章中泉。章是安徽绩溪人，三战区干训团谍报班毕业。

泾太谍报组：辖泾县、太平、石埭等地。组长徐治敏。副组长欧阳林。

青贵谍报组：辖青阳、贵池、南陵、东流、广安等地。组长先是刘士澄，后由郝雨辰升任。

此外，还在江西地区设立了南昌谍报组。组长魏光耀。

在福建地区设立了福州谍报组。组长杨一华，安徽桐城人，行武出身，为卢旭的亲信之一。副组长魏某（忘其名）。

上述各谍报组，都配有收发报机、密码本，每天可与战区长官部电台直接通报。有关行政管理、人事配备、地区部署和调度，仍归参谋处主管，但收集情报，则受情报室指导。

各谍报组一般配有组员三、四人，交通、勤务兵二、三人。各组组员的人选，概由各组组长自行选择，报请委用。还允许各组可在当地吸收一些外围分子协助收集情报，以扩大情报来源。

三战区情报室，由于掌管了这样“多如牛毛”的特务情报组织，并将重点安插在新四军的驻地——皖南地区，因此，对

新四军的各级人事、兵力部署、武装配备、战斗力强弱、军事调度、部队分布位置，以及进行的兵运、民运、工运、学运等种种重要情报，都能随时从各方面得到准确报告。从而为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付司令长官（兼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等人，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于一九四一年一月，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提供了情况。

（二）、情报的搜集和整理

情报室搜集情报的来源有三。即：战区所属各部队的政工情报单位、派驻各地的特派员办事处和各谍报组。

关于情报的处理。情报室与参谋处、政治部既有明确分工，又紧密联系，相互合作。一般地说，情报室所办理的是“静”的情报工作。即：情报室是办理情报登记、审核、整理、编报等工作；而参谋处则是根据情报所提供的内容，对对方采取军事行动，如制定作战计划、军事部署和进行部队调遣等。政治部则是根据情报的内容，办理对对方采取侦察、逮捕、管押、审讯等工作的。

例如：“皖南事变”前，情报室曾获得皖南谍报组的情报：“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多在夜间纷纷行动，企图不明”。同时，又据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来电：“新四军副军长坚持不肯渡江北上，决定向苏南地区发展，有袭击国军五十二师和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的企图”。又据皖南行署报告：“太平、石埭等县地方自卫枪枝，多被新四军收缴”。苏南行署亦电告：“新四军四支队驻苏南各部队，多向皖南边境调动，在苏北部队，亦积极扩充实力，向苏南发展”。类似上述情报，当情报室获得后，即由下属第二组负责分别把它进行登记，并认真核实其内容真伪情况，整理出有系统的资料，编制成有关各种图表和小册，如：新四军各部队主要人员名单表、新四

军各部队官兵人数统计表、新四军各部队武器配备调查表、新四军各部队位置分布图，以及新四军军事动态、新四军政治活动等小册子，先后转报国民党中央军委会和各有关部队、机关参考。与此同时，情报室还及时将所获得的情报签转参谋处核办。经签呈批可的意见是：一方面电令驻皖南各部队“严加防范”；一方面抽调驻赣川军及驻浙的刘建绪部向皖南增防。政治部对新四军的民运工作，亦拟具意见经批可后，指示皖南行署及各部队的政工机关要加强民众组训，严密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以阻挠革命势力的发展。又如一九四一年，情报室获得参谋处驻福建谍报组报称：“永安”、“民风”月刊社编辑陈伯敏、曾充“漳州日报”外勤记者，不满现实，经常发表社会新闻，讽刺政府。现在“永安”、“民风”月刊又常有不满政府言论，思想“左倾……”。情报室在处理时，除将上述情报进行登记，并汇编于旬报外，还签准移送政治部核办。最后，陈伯敏被福建省政府逮捕，押解三战区政治部专员室，转送上饶集中营囚禁。

（三）、策反活动

情报室成立后，曾策动了几部分伪军反正。

在皖南地区，经过长官部中校参谋洪为鑫的工作，策动了两千余名伪军反正，并整编为皖南游击支队，委派洪为该队上校支队长，长驻皖南南陵。

在浙江地区，经长官部少校服务员刘守高活动，策动了伪军沈觉时部在肖山地区反正。

在江苏地区，由长官部参议林祥生策动，与汪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徐朴诚部取得秘密通讯联系，待机反正。还与浙江地区汪伪浙江省主席林柏生及驻宁波的伪十一师师长谢文达取得秘密联系，工作也有进展。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